

超越传统叙事:17—18 世纪 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再思考

陈宇慧

内容提要 以全球视角重读对外关系史已成为当下学界潮流。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应该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 17—18 世纪作为区域体系领袖的中国,尤其是自我定位和总体外交关系的构想。中国当时领导的朝贡体系,存续关键在于经济支持和文化认同,比较 17—18 世纪朝贡体系与其他区域国际体系,从“东亚—周边—全球”三个层次可以说明全球化早期大国对外关系的共性与特性。通过比较分析明清易代时的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者势力的消长,可以发现,两大体系几乎同时存在,关联十分密切:很早就开始正面的竞争和较量,最终朝贡体系并非输在落后,而是维持成本拖垮了清廷财政。此外,由于耶稣会士往来于东西之间,两种国际体系也始终存在着直接互鉴,这同时影响了东西方大国国内政治的发展。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史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
区域国际体系

* 陈宇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本文是在提交给“第十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的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笔者衷心感谢许振洲教授、王逸舟教授、汪卫华副教授、节大磊副教授、刘莲莲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候选人李妍等师友的点评与指导,感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若有任何错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对亚洲史、全球政治的讨论,以及学界风行的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批判,^①如何重新定义“中国与周边”,渐渐成为人文社科学界的“显学”话题之一。然而,其中却很少见到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声音。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已经有若干公认的史学思路,而从社会科学角度如何与既往研究进行对话,同时,也为这一话题找到未来的方向乃至重构对若干问题的解释,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这会影响到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理解,甚至影响到对当前的国内外相关问题的处理。本文将在梳理学界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文献基础上,选择 17—18 世纪国际体系竞争这一话题,提出研究方向和建议。

(一) 焦点争议:17—18 世纪的“中国”和“周边”

新一轮震荡史学界和文化学界的这波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海外中国史学界的大论战。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罗友枝(Evelyn Rawski)1996 年“再观清代”的发言,直接挑战旅美华裔史学家何炳棣(Ping-ti Ho)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典文献《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②事实上,这是对传统帝制中国的重新定义,并且直接引领后来“‘新清史’四书”的出版,以及在 21 世纪初使“新清史”学派在海外汉学界名声鹊起。随着国际学界(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重构欧亚史乃至全球史,该学派崛起有多重复杂原因。^③这一问题在 2010 年后急剧升温,实则与台湾史学家汪荣祖和复旦大学历史系

① 葛兆光:《何为中国? 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 页。

② Evelyn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5, No.4, 1996, pp. 829-850.

③ 有学者认为这与学者的个人背景、西方对于“征服王朝”理念的传统继承和欧美后现代史学的解构都有联系,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2—23 页。此外,杨念群、甘德星、刘小萌等学者也曾多次撰文,详细梳理并分析批判“新清史”的主要观点源流。定宜庄和欧立德认为,新出现的中国史叙述脉络并不继承自传统中国史学,而是借助“日本东洋史的关联”和“新的学术推进力”,这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迭代学术成果积累的惯性所致。参见定宜庄、欧立德:《21 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载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6 页。

姚大力教授的论战有关,并卷入了多数研究元以后中古史的中外学者。^①其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双方关于汉化、考据、战争性质等你来我往的攻讦,归根结底是如何认识“中国”和“周边”。这一问题应该被视为中外学界在现有成果上寻求新突破的集体尝试,也应该视为中国学者在新千年以来在当代中国地位提升的背景下重寻话语权的一次机遇。无论观点如何,史学界已经走在前列,如果有理论突破,则连带中国国际关系学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很可能被直接改写。

焦点问题首先在于如何认识“中国”。随着论战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到许多对话甚至有了学术论争政治化的倾向。^②粗略梳理一下,大的论争现在并不集中于“中—外”对话,新一轮有关中国学界根本立足点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世界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中,传统史学和现代自由主义立场的分歧,^③即是否需要解构民族主义史观和“大一统”“天下”等叙事概念。这显然有当下中国飞速发展、民族主义立场在整个学界重新抬头的大环境影响——现实中各国政治地位的消长,尤其是“复兴”之于中国学人乃至一般民众的特殊情结,使哪怕是在国内学者之间展开的讨论也很难不发展到尖锐对立。新清史学派之于中国学界,最大影响是拓宽了问题和材料的涵盖范围。而且17—20世纪的中国作为存在多元政治文化的国家,已经是一个共识。其中,广受抨击的所谓反对“汉化”进而“分裂中国”的观点,也有学者否认并认为21世纪前期中外学界的所谓对抗并不存在(myth-making)。^④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展开的这一波史学“2.0版”讨论,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重论“中国学派”建设的可能性^⑤的努力终于有了重合,这可以视作一个重大的学科交叉支

① 有关论战的文章和评论广见于近年来学术期刊甚至报章杂志,有结集出版者,例如参见《上海书评》编辑部所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较新且全。

② 典型文章如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chis.cssn.cn/zgs/zgs_pl/201504/t20150420_1592885.shtml;杨益茂:《“新清史”背后的学风问题》,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bk/bkpd_qklm/bkpd_bkwz/201507/t20150731_2102992.shtml,2017-10-09,等等。

③ 葛兆光:《名实之间——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3页。

④ 柯娇燕在评论中认为罗友枝对“汉化”的批判,目的实际上是对费正清学派的反动,即“用文化熏陶的神话”使“使得真正的复杂性、演变及同化和涵化的局限变得模糊不清”,参见2016年2月20日《War of the Worlds! 论战》一文,参见柯娇燕的个人主页:<http://www.dartmouth.edu/~crossley/comment.shtml>,2017-10-09。

⑤ 2004年12月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创建中国理论、构建中国学派”的倡议。参见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6页。

撑机遇。

由此延伸的关于“天下”与周边秩序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刊文层出不穷,但国际学界与中国学界似乎并没有在学科层面上进行对话和交流。国际学界的热门议题主要是对于18世纪比较政治史的发展^①(尤其是对“帝国”的比较研究),其种各学科相互促进产生出许多成果。例如,早在2002年即有学者宣告奈格里(Antonio Negri)帝国论的终结,讨论这一概念与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系。^②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对历史上的著名帝国及其国际秩序的重构,其中也包括对“中华帝国”的再反思(重要的贡献也来自于拉铁摩尔以来的内亚学派甚至新清史),最近的一次讨论来自历史社会学期刊“Thesis Eleven”所辑专题,^③其中濮德培(Peter C. Perdue)延续了他一贯的研究方式,着重讨论如何使跨国史(TNH)和比较帝国史(CIH)两派学者产生互动,解构东亚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中历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视角,并提出新的类似“中层理论”的研究路径,例如经济、文化和生态学。^④这也说明尽管帝国比较研究是一个相当宏大的议题,但海外学者着力的主要是次级层面上的路径突破。^⑤

这一点恰恰与中国学者既有的叙事惯性形成冲突。恰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所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叙事会忽略17世纪以来中国领土扩张的一面,制造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界的经典叙事模式;^⑥同时,一些学者会自动将“帝国”(empire)与“帝国主义”(imperialism)自动联系起来,继而认为这是对上述经典叙事的解构,并产生质

① [美]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内部刊印·清史译文新编第九辑,第13页。

② Tarak Barkawi and Mark Laffey, “Retrieving the Imperial: Empi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1, No.1, 2002, pp. 109-127.

③ “Thesis Eleven”为国际知名的批判理论与历史社会学集刊,2017年4月该杂志第139期刊发专题文章,主题为“帝国与民族国家(Empires and Nation-states)”。专题文章名录和摘要参见 <https://thesiseleven.com/2017/04/19/issue-139-april-2017/>。

④ Peter C. Perdue,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 of Asia: Its Promises, Perils, and Prospects,” *Thesis Eleven*, Vol.139, No.1, 2017, pp. 129-144.

⑤ 即从以多学科的视角接入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尤其是领土关系)的讨论,濮德培在其著作《中国西进》中,从经济和生态角度研究清代中国与“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的关系,并以此为立足点讨论现代理论对中国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影响。参见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⑥ [美]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载[加]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06,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64页。

疑和批判,故而在国内始终很难与国际上热门的比较帝国史进行对话。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传统经典叙事的解释力或者下降或者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更多学者只能回到中国古典的“周边关系”中去借鉴较有包容性的概念,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来阐释今天中国的外交格局和理想。显然,这类研究没有在学理层面回应上述海外学人提出的问题。

(二) 现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回应缺位

在学界热论的关于17—18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浪潮中,国际关系学者的缺位实在令人遗憾,最根本的问题是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在2006年所言的“认同困境”。^①不仅中古史学者要面对“中国是谁”这个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人同样要面对这个基本话题(虽然关切未必一致)。在这样的困境中,虽然近十年前就有对现有问题的深度剖析,^②但时至今日并没有根本改观。

由此而来国内学界对中国与周边秩序的讨论尝试。这些研究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梳理总结古代经典论述中关于“政统”和“天下”的讨论,包括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梳理(如阎学通、叶自成等^③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比较,包括国内学者对早期海外历史主义中国研究,如费正清、施坚雅等的借鉴);二是藉由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训练,以现代语言做理论建构的尝试(如秦亚青、“上海学派”等);三是以赵汀阳、汪晖为代表的以政治哲学切入话题的系列著作。但是,这三种路径都不是对前述重大争议的正面回应。

梳理总结过去中国历史事实与文献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的讨论,这是最常见的经典研究。这类研究成果首先提炼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资源,借鉴史学/策略类文献,以及现当代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如现实主义的相关论述)进行讨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13页。

^② 张志洲:《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75页。

^③ 例如,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

一努力,所缺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其中,“华夏主义”也在外交思想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这种研究多少与上述三个源头中的第三类有相似或者重合之处,在关键概念上不采用现代或者西方语汇,用前人或者中国传统逻辑梳理过去的思想和历史资源。因此,研究素材或者案例一般来说集中于先秦,或者以断代研究为多,而在提炼和总结时概念就显得过于笼统、缺乏详细可靠的连贯材料佐证或者断代性比较强。反观当下美国的区域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因为通常是理论先行,所以可能在史料的选择和裁剪方面失之偏颇,比如,江忆恩的“文化现实主义”基于对明代永乐至万历朝奏折的案例析中国的战略文化历史。因此,除非研究区间相似,否则,恐怕很难产生有效对话。而对13世纪以后的海外中国史研究的相关议题,前述研究则不以之为重点。宽泛的概念套路,以及经典叙事惯性中对元至清期间中国所谓“专制高峰”的认识,导致很难见到国内国关学界对所谓“近世”以来中国与周边秩序的有力阐释。这类成果通常来自史学界和文化学界,尤其是新材料的引入,例如,葛兆光所做的对宋代以来中国“近世”民族主义远源的研究,以及在《想象异域》中对燕行录的重新梳理,^①后者或多或少体现了史学界对“周边看中国”这一命题的前瞻和理论关怀。

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概念与逻辑的尝试,在理论产生过程上与西方较为相似,但是,依然不能解决学科缺位的问题。首先,理论要素包括共同的符号概念、信念价值和范例,^②但要在概念的整合上达成共识,首先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如果从范例上来看,早先学者认为可以汲养的“儒家思想与朝贡体系的实践”,^③一方面,面临断代贫乏的尴尬局面(有学者指“秦汉以后,除夷夏之辩,原创性的国际思想几乎枯竭”^④);另一方面,对既有概念的解构不断发生(如近年来对于海上朝贡“虚幻性”的认识,^⑤以及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

①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以及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② 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12页。

③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页。

④ 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第13页。

⑤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Henrietta Harrison)关于乾隆时代周边战略的再研究等^①)。而理想中符合中国国际关系学需求的整合概念,应该“有明显中国特色、又反映当代世界新变化”。^②其次,如果跳过整合概念这一步,直接寻求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则会面临或多或少“水土不服”的问题。毕竟,中国学者的根本任务应该是从本土资源中孕育出来自己的理论,并且“以己化他”具有普世意义的体系,而不是西方逻辑的验证和再诠释。那么,在关键性的理论尚且不能取得共识的前提下,如何能与具备雄厚研究实力的其他相关学科产生对话和碰撞呢?

在这方面,目前与前述焦点议题能产生最多共鸣、且已经在海外学界有较大反响的,当属政治哲学路径。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认为,“天下”是关于帝国的一种“理念”乃至“理想”,^③首先,这就有了对话的可能性;其次,这一体系论划分了三个层次即地理、心理和社会。具体到政治秩序,“天下体系”被定义为一个“制度世界”,并且用西方人能懂的理念来解释中西理想世界秩序的差异。而且,赵汀阳的理论特地援引了“无外”这一古代概念来排除近代民族主义的模式,^④甚至在比较帝国史研究方面,也做了新鲜的尝试。所以,赵汀阳从理论上建构了自己的基本要素,虽然探讨的是老话题,但话语是全新的,但又同时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汪晖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讨论夷夏问题时,他选择的分析对象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力图通过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写作,将民族主义的诉求与批判结合到一起,进而内化夷夏关系为相对的国内关系。^⑤这其实是以新儒家的现代话语重述传统思想,也获得了许多回应。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问题的成果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受到学科性质和成果形式的限制。其理论内核很难直接拿来使用,需要大量的诠释、调整和配合案例,而国际关系学界目前并没有成规模地做这种学科支撑工作。哲学界的新成果可能在未来从根本上重塑“中国问题”的形态,而在当下实践中,则

① Henrietta Harrison, "The Qianlong Emperor's Letter to George III and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Origins of Ideas about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22, No.3, 2017, pp. 680-701.

② 郭树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前途》,《国际观察》2017年第1期,第38页。

③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8页。

④ 同上,第35页。

⑤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78—679页。

可以帮助人文社科界其他学科(如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在国际对话中争取话语权,能量并不逊于当下风头大盛的内亚学派重兴和全球史的再写作。但是,否能把握住这一波讨论浪潮的机会,以及如何具体产生学科间的合力,可能是接下来最现实的问题。

二、发挥优势与学科互鉴:以17—18世纪中国的对外关系研究为例

17—18世纪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早期进程,世界处在大的动荡、变化与重组中,陆上“丝绸之路”方兴未艾,欧亚大陆的强盛国家,为这条纽带提供了政治保证。当时,中国正处于明亡清兴之后经济社会的恢复上升期,尤其是帝制时代最后一个公认的盛世;在大陆西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也已经凭借着大航海积累的经济优势迅速成为极有实力的国家。彼时情势,对今天的国际格局和中国外交不无借鉴意义。从研究对象来说,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的焦点话题在这里走向交集。那么,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历史主义路径即从国际关系史中抽象出范式的方法,责无旁贷地应该进入上述重大问题的讨论并争取获得一席之地。本文认为,为求抓住时机、争取主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将重点放在立足17至18世纪中西交通史现有研究成果,加强对这一时期的研究。

(一) 既有研究与核心目标

通过检索发现,近年以来关于明清时代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有大量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研究论文出现(676篇),相对于史学界(375篇)形成一个小热潮。尤其在2004年后,随着相关议题进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范围,以及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以服务整体战略为目标的许多研究成果应运而生,在2013年新一代领导集体诞生前后达到高潮。在诸多研究中,除题中应有之“中国”外,关键词出现频率和趋势几乎都与当下政策热点相关(如朝鲜、日本/钓鱼岛问题、“一带一路”构想、南海等),足以证明这一点。

单纯服务现实政策的研究固然必要,但也造成了繁荣的假象。众所周知,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参与,需要集结学界众人的力量相互砥砺,研究才能

出成果,而针对细节问题或者空泛的战略目标提出看法,如果没有集群、回应和修正,实则意义有限。政治学科下的论文,除少量专题讨论之外,多半集中于为传统“天下”概念的合法性做泛泛注解,以证明中国学派的合法性;或者回应决策层关于汲取传统思想资源的号召;或者以明清史强行带入西方理论嵌套,却没有办法和史学产生对话。所以,直接结果是除个别期刊讨论“近世”以后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和外交思想外,整个政治学和国关学界的论文反而是零敲碎打,没有形成专题和集群效应。故而,除专著外,在对明清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理论的探讨中,发布数量前十位的期刊中有七家是历史学期刊。^① 反观国际关系学领域前述论文数量的急剧上升可以看出,不能归因于研究对象本身是历史问题,而实际上是国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界缺位于全球史/区域国别史的热门议题讨论使然。

如果将上述检索结果中专门讨论这一断代期的高引用率论文挑出来分析,国际关系学界似乎很难同时驾驭同一时间段中中国对外关系两个以上的不同面向,例如内亚和东亚。^② 对“天下”和“国际秩序”的讨论总是局限于理论或历史的某个局部,而没有办法做出以中国为主体的“整体国家对外观”研究。这似乎佐证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诸如新清史学者分割政治文化、强调内亚性与传统东亚相异的观点。倘若果真如此,这当然从根本上解构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性质,进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丧失了主体性和原创的任何可能,甚至会带来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危险。何况,诸多中国史学界的学者也有成果从反向说明事实未必如此。因此,在解释17—18世纪处于全球化初期下的帝制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上,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的理论显然确实存在进步空间。

国际政治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应该怎样的有别于史学?笔者认为,应该表述为如下命题:即以社会科学的方式,验证影响国际体系势力消长的一般要素,为朝贡体系与欧洲国家体系此消彼长的历史现象找到一个合理解释。其主要任务应包括:首先解释作为体系领袖的国家(中国)对外

① 上述数字均来自于中国知网(2017年10月)。

② 例如,国内研究“天下”秩序与国际关系的代表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扬帆副教授,在其文章中主要讨论的是“天下”概念的现实与想象差距,进而提出“复合结构”理论。但在文中对内亚叙述的部分,引用了自拉铁摩尔、巴菲尔德以来的西方观点,几乎没有正面回应近年来支持“中央欧亚”观点的学者们所带来的争议或者做出讨论。参见《“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39—44页。

部的定位和总体关系构想是否有普遍性,与其他体系的强大国家相比异同何在;找到体系存续的关键要素,是否是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的资本、战争等,如果东方国际体系具有特殊性,或者某种影响体系存续的因素有特殊权重,那么,这个因素究竟为何?上述理论需能在比较研究中可验,并使用古今通用的符号通式(概念)进行抽象,初步形成理论。这一命题由中国学者来完成的意义,在于其路径和论证过程本身贯穿中国价值,包含了“证明‘中国意识’”的前提设定。

以社会科学的方式,即首先存在假设(assumption)然后进行验证,而非史学界近年来盛行的以考据学排除范式和叙述偏见的人文学科逻辑。这里的预设命题应该是“中国在17—18世纪的对外关系上相对本国历史和其他帝制国家,都存在特殊性”,这一表述应该是公认的、没有很大争议的。这也应该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题中之义的一环——即不同时代下相比他者(the other),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与理想都存在特殊性。明清易代期的特殊性表现在:相对本国多数时期的历史,征服王朝(conquering dynasties)统治者的异质和广袤领土下地区(尤其是边疆)之间的差异——主体的变化相对于理想体系内的其他行为体会带来影响;^①相对于其他帝制国家,在于墨菲所谓“季风亚洲”(Monsoon Asia)的地区秩序与典型欧亚大陆帝国周边的差异。^②纵向和横向的两种差异,实际上虽然承认断代区别,但同时通过比较方式,弥合了主体在时间中的连续性。承认特殊性的同时,将东西帝制国家进行对比,虽然赞同了内亚学派的部分观点,但应该是对内亚学派尤其是其中较为偏激观点的一种可行的正面回应。且国内中古史学者的努力主要是针对主体即中国本身的性质划定,而国际关系学可以通过讨论主体的制度安排和实践,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多民族大一统”的价值观念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同时补充本学科既往对于这一断代期对外关系史精细个案的研究,继而将不同时期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模式丰富并串联起来,为理论原创奠定初步基础。

在以上述公认史实为基础提出假设后,主要任务应该是对研究区段内不同面向的中国对外关系做抽象和整合。在明清易代的中国,无论是谁为统治

^① 已有讨论可参见李扬帆:《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3期,第125页。

^② 学界已有大量关于“天下”“朝贡制度”和西方传统帝国世界秩序的比较讨论,不一一赘述。

者,都要面对不同方向的不同问题,这也是内亚学不同于传统国内政史叙事的重要论据。这需要借鉴边疆史地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需要高度的理论抽象。近年来,国际关系史研究或曰历史主义的路径,未必在理论创制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上述命题与国际关系科学理论研究^①多有重合,因此从学理上具备重要意义。

(二) 讨论空间和学科互鉴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历史主义的路径尝试,其基础还是大量对历史个案的研究。在正面回应上述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挑战时,所有对中国问题、中国意识抱有理论期待的学者面对的是所有学科共同的原创性缺失。^②一方面,体现在中国本位的自觉性不够;另外一方面,还要面对不同学科性质的差异。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范式、理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由此而来的偏见和局限正是近年来人文学科力图改变叙事方式或者研究路径而规避的。同样,对规范性的重视程度,学科之间也会存在差异,但这也是所谓“不可说的部分”^③在学科交叉的空间内有存在可能,也会使人文社科领域很多被认为老旧过时的思想重焕生机。

倘若将所有力图确立中国特色(理论、范式、学派)的学科视为某种共同体,则在回应本文第一部分的焦点争议时,国际关系学天然占有独特地位。首先,社会科学领域能够就“天下”观和理想世界秩序做出研究和回应的学科本来就很少;其次,国际关系作为次级学科同时具备了跨学科的特性,第一要综合多种研究进路和方法手段,第二研究对象符合“超越单一学科界限或学科实践范围的问题”^④的界定;最后,国际关系学的任务应该包括构建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联系。延伸出可以合作的学科,包含中古史、全球史、思想史、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等等。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在其他学科中尚待探讨的层次问题,在国际关系学的视角中理所应当地被清晰划

^① 阎学通曾指出,国际关系科学理论研究主要有三方面工作:第一,发现(discover)规律,这是最基础的研究;第二,解释(explain)现象,也就是创立一个解释某一国际现象的说法;第三,依照发现的规律或是创建的解釋进行预测,在何种条件下,此类事情还能发生。参见《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36页。

^② 杨念群等:《研究范式与学科意识的自觉》,《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1—12页。

^③ 同上,第10页。

^④ 刁娜:《跨学科研究的哲学探究》,《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第34页。

界。如果以国际关系学切入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从“东亚—周边—全球”三个层次来分析:

1. 17—18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无论是在史学界还是国际关系学界,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已耕耘多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近年来新史料的开辟,则将过往许多视为理所当然的“故事”翻新。其中主要的进展,一是中国国内政权易代带来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二是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看法的再认识。具体而言,第一个问题是地区秩序安排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当“理想”中的中华正朔由于征服王朝的侵入而发生变化时,是否会带来地区秩序的改变?近些年,历史学者开始注重由域外史料来补充过去中国官方历史叙事的不足。日本与韩国学者对此也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除李扬帆等少数几位,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一个亟待开垦的新领域。目前有大量文章对“天下”体系进行一以贯之地注解,说明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在中国国际地位复兴趋势不可逆转的当下,重新接续起我国对国际秩序认识的历史脉络十分必要。历史上朝贡制度似乎被视为当然,然而,在当前史学界新开垦史料的冲击下,不仅朝贡制度本身有许多问题尚待理清,而且朝贡制度是否在东亚有切实存在,以及东亚是否存在单向的“中国—其他国家”文化和政治的输出,也成为大问题。如果周边国家本身对于“正朔”是否存在于中国产生了质疑(例如朝鲜认为“明朝遗制”才值得骄傲^①),那么,这会动摇400年以来中国作为有压倒性优势的东亚国家地位,继而影响我国经典历史叙事的全部根基。因此,详细解释不同文献中存在的东亚秩序的“理想”“现实”差异,是必要而且紧迫的工作。对此,国内史学界已经有大量对《燕行录》和其他东亚文献的搜集整理似可借鉴。

第二个问题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再认识。例如,早在清代同期,一衣带水的日本就有学者通过当时能找到的有限材料开始观察清朝政治。这在当时获取文献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依靠作者的艰苦努力和对满文的充分把握做出的制度史研究。按照筑波大学楠木贤道教授的观点,以获生北溪为代表的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对于清代政治的认识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学者的看法,也和后世

^① [朝鲜]《承政院日记》(英祖11年11月1日)载:“威继光遗制,而我国素全用矣。号令承接,都在于此,决不可偏废云云矣。”

欧美学者的思路有所差异,他称之为“江户时代的‘新清史’”。^① 获生北溪在《关于明清异同的料简书》中指出,清代改良了明代政治,其所拥戴的满洲皇帝,其“中华”观念并不绝对围绕儒家的价值观,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此,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内陆亚洲政权特性。同时,由于其政治制度是将本民族的旧有习惯强行安置在明代的诸多体制中,因此没有拘泥于“中华体制”,而呈现一种分散性的权力状态。可见,虽然并未与欧美当代学者谋面,然而百多年以来,域外中国研究早已将中国视作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其中对外关系也从内亚延伸到太平洋西岸,而不是目前中国国内学者所拥护的主流“天下”观。这样的研究成果已被国外学者注意多年,而国际关系学者鲜有结合国内边疆史地学的成果来为“天下”重做近世以来的注解。而“内”与“外”的历史之别,又使历史学者似乎无力参与这一阶段的讨论,造成相关问题似乎只有专门做地区民族研究的学者才能够有专业发言,实则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缺位所致。

2. 17—18世纪中国的周边战略。如果上述问题还因为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特性在学科分解下显得问题意识模糊的话,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古代各时期的具体周边战略为何就更显得问者寥寥,而更多学者却投入到当下的长期或短期规划中。然而,如果不知古言今,何来“自古以来”?这一周边战略主要涉及到将对不同面向的周边国家政策,统一到一个逻辑中。这需要研究具体的与朝贡、外交相关的文献,尤其是皇帝本人的思考。史料上并没有太多新发现,但对旧有史料的研究并不充分。例如,对个别朝贡国的政策,是否一以贯之?——康熙五十九年,暹罗国王遣陪臣恭奉金叶表文入贡,是和一个西洋国使臣一起完成奉表仪式的。^② 然而,到乾隆年间,暹罗已经位列朝鲜之后,^③成为重要的“外藩贡国”,甚至乾隆皇帝会亲自训谕安南国王,调停暹罗与其两国纷争。^④ 可见,即便在体系秩序之内,甚至在一个方位上的不同国家,随着时间推移其与中国的疏密程度也会产

^① 引自楠木贤道2016年6月16日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讲演及其文章,参见〔日〕楠木贤道:《江户时代享保年间日本有关清朝及满语研究》,阿拉腾译,《满语研究》2013年第1期,第76页。

^② “设表案于畅春园殿阶下正中,圣祖仁皇帝御殿升殿,礼部鸿胪寺官引贡使奉表陈案上,退行三跪九叩礼,仍诣案前奉表,由殿左门外左陛膝行,至宝座旁恭进,圣祖仁皇帝受表,转授接表大臣,贡使兴,仍由左陛降出左门于阶下,行三跪九叩礼,入殿赐坐、赐茶毕,谢恩退”,参见《皇朝通典》卷六十·礼二十。

^③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五日。

^④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七日。

生变化。例如,在朝鲜实录的记载中,安南由先期的“能礼让”的同类友邦,变成了乾隆后期需要较劲的竞争对手^①这类研究,并不常见于国内国际关系学者。然而,这种周边国家“事大交邻”的政策,难道不与今日“制衡”“对冲”等名词异曲同工?这些国家的古代史文献,多数由汉文写成,今日其本国学者来研读甚至也较为吃力,而对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需要任何语言上多做工夫即可开发出新资源。

如何统合“内”与“外”,中外历史学者有了初步尝试。目前的共识在于不应该机械地以历史或者现代疆域来规定中国的边界,实际上,“藩部”^②和“贡国”未必有清晰边界,因此,也不可能完全清晰地落户在当下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对研究周边关系的中国学者来说,不仅可以利用上述域外的汉文文献,同时,其他语言文献尤其是内亚学派所关注的史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放在本学科视野范围内。即便是关注当下政策的学者,也应该出于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现实考虑,追溯这一历史遗产。

3. 17—18世纪中国整体的对外关系。这是更广泛层面上对中国300年以来的总体对外关系的总结和研究。如果站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史浪潮的视角可以发现,目前尚未有对明清易代以来中国整体对外关系的考量和研究。当然,这与历史学界盛行问题“何为中国”尚未有清晰答案相关,但反过来说,如果能对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有明确划定,那么,通过“取非”而“言是”,未尝不可能是对其他学科的一个助力。尤其是对东西交通史的比较研究,这几乎是崭新的学术处女地。一方面,专研东亚的学者或是受制于语言,或是受制于学科惯性,很少有学者在一个时段内横跨东西两个面向来在更高层面上阐释中国在彼时的政体对外构想;另一方面,材料散见于域外文献,搜集工作尚未没有见得系统性的成果。

在这一领域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东西方之间是否在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即18世纪末)才产生碰撞?实际上,这个问题随着欧洲汉学界的整体没落和美国史学界尤其是后现代史学的强势崛起,已经被大大地泛化为多种叙事的重叠和碰撞,而限于学术讨论本身,例如对芝加哥大学何伟亚(James L. Hevia)教授的专著《怀柔远人》及其是否应被授予“列文森奖”的争论。然而,

① 《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十四年(1790),卷二十九,三月二十七日。

② 藩部的定义,不应集中于地理意义,还有文化和历史、政治含义。参见〔日〕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王帅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05页。

这种对比在之前就已经出现。前文谈及沈艾娣关于乾隆朝是否已经知道西方威胁即为一例,而这一传统更早则能上溯到从明末到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朝廷与耶稣会之间的关系。然而近20年来,中外学界的主流学者认为,对耶稣会这一主题的研究能发挥的空间不大,将视线放在这一领域的已主转为宗教学学者,他们的意图是通过中西之间哲学与宗教在17—18世纪的对话,为今天的中国国内宗教治理和中梵对话找到出路。如果抛却纯教理问题,而将来华传教团作为使团来对待,理清其中与朝廷尤其是皇帝本人的政治联系,话题似乎远没有完全结束。2008年,密歇根州立大学柏理安(Liam Matthew Brockey)教授出版的《东方之旅》,^①这是从史学角度来为耶稣会远东传教团作传,显然已经脱离了上述窠臼。笔者也曾试图以比较方式,探讨与教廷交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建交史的规律。这些事实层面的规律探讨,倘若涉及到思想碰撞,依然离不开思想史和宗教学相关研究的辅助。此外,明清之际西学本身已经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甚至被四库馆臣们撰文提及,^②可见西学之于中国宫廷政治的影响,在政治意识形态导向上也有过“近世化”推动作用,当属于今天所谓“人文交流”的考察范围,显然不应该被史学和宗教学界所专美。近年来,新整理的史料及广布在巴黎、上海和梵蒂冈等地尚未被整理的史料,还需要国际关系学学者进一步关注。

二是地区与国际性的秩序是否在当时已经分出层次尚待商榷。例如,实录和耶稣会的文献中均有记载,当不同欧洲国家的传教使团在北京因为赞助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势力范围重叠的原因产生互相攻讦和“打小报告”的齟齬时,^③皇太子胤礽出面调解并平衡关系。^④然而,安南使团在承德与朝鲜使团的文化比拼,却没有得到乾隆皇帝的调停。^⑤所以,面对不同使团之间的争执纠纷,不同时期的中国朝廷采用不同方式(或者是因为史料缺失而不明)。而且,清廷禁止朝鲜使者与西洋传教士往来,但东西使节并没有严格遵循,而是私下

① [美]柏理安:《东方之旅:1579—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毛瑞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 黄兴涛等主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页。

③ Joachim Bouvet, *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résentée au roy*, Paris: Meyndert Uytwerf, 1699, p. 44.

④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郑德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卷,“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神父致本会洪若翰神父的信(1704年8月20日于北京)”一节,第4页。

⑤ 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29页。

往来频频。^① 如果以此推论,则中国不光是过去所谓“东亚秩序”的中心,甚至是世界走向全球化先声的一个平台。如果将散见于域外史料和中国旧有的“近悦远来”的“圈层论”结合起来,那么,不仅可以在东亚史的范畴内讨论中国过去的地区秩序安排,甚至可以上升到作为地区大国在300余年前对国际秩序和来往的一个讨论——地理区域的分界近年在史学界已经逐渐模糊起来,但在国际关系学中,地缘政治逻辑的影响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而这一跨学科的研究,前景恰恰大有可为。

三、案例:17—18世纪区域国际体系的消长

1648年确定下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与基础,如果将视域拓宽,我们会可以发现,这一时间正好是东亚朝贡体系最后的辉煌阶段,同时也是其衰落的开始。1644年明朝灭亡,明清易代正是本文重点期待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历史节点。过去普遍认为从“认同”到“条约”,从传统到近代,两者的消长实际上是两个时代的交替,也就是说应放在一个线性时间轴上进行比对。国内现有的研究多数对这一节点认识有两种观点:一是两者在势力范围甚至作用时间上是割裂的,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发生交汇;^②二是朝贡体系中非等级制、非剥削尤其是包含儒家秩序文化的一面,是中国今天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宝贵传统遗产。^③

这里显然可以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两者果真是从不互闻,直到“船坚炮利”给处在中古时代的中国人打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新大门吗?显然,至少清代存留文献会使人们对此看法有相当怀疑。毕竟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叶,欧洲人曾经相当程度地参与了中国的政治,不可能不将欧洲建立以军事为主轴的新中央集权制国家描述给中国皇帝,而且康熙与路易十四甚至有间接的书信往来;二是如果朝贡体系确实作为曾经与中世纪的欧洲封建体系或者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立的国际体系,那么,其失败原因果真是一般所称因为没有欧洲的“船坚炮利”而式微解体么?

① 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15页。

② 刘丹忱:《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5期,第78页。

③ 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132—143页。

关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清代顺利地继承了传自明王朝的朝贡模式,并至少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和平。朝贡模式“假定中国在道德、物质、文化上要比别的国家优越”,要求臣服于天子,“体现中心权势、优越地位和自给自足的形象”。^①但无可否认的是,明清易代带给宗主国的最大危机是文化认同。“以夷变夏”的直接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在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不仅满洲认同产生了国内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挑战,同时,其身份在周边国家中同样激起波澜。例如,朝鲜认为,“地理上的中华帝国在思想和学术世界上已经是千疮百孔”。^②而自嘉靖30年后,曾经作为“不征之夷”^③的日本即已经不再参与朝贡。因此,如果朝贡体系最重要的基石是所谓认同,从国际关系视角来看,这一体系因为明清易代确实在慢慢消解。甚至除例行公事外,多数时候已沦为某种表面文章。因为东南部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国家也并没有严格遵循朝贡的时间和路线(例如安南),而朝鲜已经在背地里对新上位的满洲统治者颇多微词。

除此之外,清朝自身多面向的统治政策和形象,本身也对旧有的单一朝贡体系具备一定的解构意义。例如,清廷开始前所未有高密度地处理西面边疆和邻国的关系。一些学者在讨论清廷西进的世界史意义时曾经认为,向西的武力扩张永久地将游牧民族从历史舞台中驱逐出去。这是17—18世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几乎所有当时中央集权制的军事国家都会这么做,^④这也将传统朝贡体制拉到体制优越性的聚光灯下进行直接比试。因此,采用安抚与武力交替使用,^⑤是清朝在西面的主要交往方式。合理拉拢蒙古制衡西藏等,就体现了较以往不同的边疆管理方式。而在对外关系上,政策的灵活性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对朝贡的背离,剿灭准噶尔,与沙俄的博弈,都体现出这种面向的博弈。《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⑥即如此,在平准战争进入白热化要求沙俄中

① [美]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② 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3页。

③ (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一〇五,第571页。

④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2005, pp. 9-10.

⑤ [美]费正清、赖肖尔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⑥ [日]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王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

立的情况下,清使甚至愿意反复叩头以达到缔约目的,^①这样的举动是不能放在朝贡的维度上来理解的。因此,在横向与纵向上,明清易代都具备了自己的独特意义:横向上,在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倡导所谓“主权国家平等缔约”时,清廷在东亚保留了旧时代的基本体例;纵向上,与明代相比,清代具有更广泛的交往范围和可控领土,更接近普遍意义上的所谓“帝国”,而非传统中原王朝国家。这种对外政策上的成功,使得清代领土远超明代,并且更多参与到内陆欧亚资源的分配中来。同时,也可以看到,清统治者力图借此建构在朝贡体系上更多的合法性。^②

另外,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现的相对均势状态实际上也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中,例如,法国和瑞典都因为这一系列条约获得了重要的战略通道,成为新崛起的国家,而欧洲大陆上天主教廷的影响被进一步削弱^③(也正因为如此,来往于大陆两端的耶稣会士似乎并没有认同新体系的诞生,并将这一信息的重要性传递给远在东方的清朝皇帝)。同时,这一主权国家条约鼓励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进一步通过在海外扩展资源和领土攫取利益提高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这也刺激海外殖民时代的到来。欧洲国家在远东不断建立新的据点,这是之后两种国际体系直接冲突的前线,清廷并非不了解这些国家的动向。但对于其背后国际体系和时代的变化,则似乎未尝有所知觉。

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学者似乎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回应西方学界已有的关于长时间区间关于国际体系的若干论述。例如,查尔斯·蒂利在其论著中认为,欧洲的君主为了资源发动战争,促使欧洲国家从早期多样的国家形式逐渐集中到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而最终资本强制型国家会取得体系中的胜利者与领导地位。^④如果按照蒂利的看法,17—18世纪的中华帝国实则也接近于其所说的资本强制地位,因为与蒂利所举的匈牙利或者沙俄对比,清廷显然“枪”多“钱”多,更接近早期现代民族国家特质。那么,如前文所述由

① [美]费正清、赖肖尔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4页。

② (清)弘历:《御制十全记》,载《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百十四,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三日。

③ Larry Ja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and Philip J. Costopoulos, eds., *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于历史的种种条件,未必在竞争中占下风的清廷成为了朝贡体系的宗主国之后,反而在国际体系的竞争中落败,那反过来似乎只能检讨体系制度是否在两者的比较中对清廷造成了拖累。从全球视野上回看这段历史,如果真的将17—18世纪的转折认定为两种国际体系竞争的开始,实际情况是“欧洲诸强 VS 清廷”。而维持一种国际关系的体系(无论是区域还是国际的),显然成本极其高昂。

史学界公认,乾隆朝之后清代开始走向衰落。国内的动力不足直接导致了清廷维持国际体系的能力受限。一方面,“盛世人丁永不加赋”的慷慨国策,在康熙朝颁布之后使税赋额不到全国生产总额的5%,进而削弱了财政基础,由盈转亏最终出现在18世纪末。而国家财政间接影响了行政效能,使本就广泛存在的地方离心性进一步增长,^①进一步形成了国家力量与脱离垄断之间的张力,而这样的矛盾广泛存在于经济调控和政治治理中;另一方面,上述国际体系竞争的关键指标是军事能力的衡量,因为其建立往往依赖于若干强国的军事征服,而其维持也源自武力的扩张和博弈。清廷的常备军越来越不能打仗,有些迹象在17世纪末已经出现——“畏懦不前、坐失险要……且糜费粮饷、倍于他处。究之寸步不能前进”^②——但由于作战模式的变化和火器的进步,中央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一再被削弱,^③对地方军队的依靠形成了清末割据的状况,也无法集国家之力对外来势力入侵或挑衅进行有力回击,而这种去中心的国内军力分配又加剧了中央集权的削弱。所以,当国内走向瓦解时,整个体系就没有办法有效维持或者扩张。这就使得原本单独支撑朝贡体系的清廷,没有办法继续在东亚延长其实际影响,一来成本太大,二来其国内治理的衰败也加剧了周边势力对其的怀疑和不认同,加之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蚕食,清廷慢慢自动滑向了四面包围的深渊。

因此,清廷最终被船坚炮利的列强在19世纪中叶敲开国门,并不始于

① 罗威廉关于麻城的相关研究结论,可参见〔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李里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页。

②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五十五,康熙十四年闰五月五日。

③ 〔美〕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1840年甚或1760年代的工业革命。^①从上述比较来看,似乎更像是一个酝酿了200年左右的“大势所趋”“命中注定”的过程。如果要找中国近代史苦难的发端,可能必须从明清易代入手进行分析,绝不应只追溯到乏善活力的乾隆中后期。同理,朝贡体系的瓦解一方面清廷国家治理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国际体系之间在17—18世纪存在激烈竞争,而清廷显然“单挑”失败,甚至无力回天。如果理清了这一原因,并由此解释一系列17—18世纪间中国的对外关系问题,可能一些结论需要重新思考。比如,对朝鲜“事大交邻”^②体系的形成,清代皇帝是否知晓并主动应对?是否在维持和平秩序的情况下,对东亚各朝贡国中采用制衡的策略?再比如,中俄关系远不止是两国在边境和贸易上的诸多议题,事实上牵涉的是所谓帝国体系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势力分配,甚至这两个国家就是在所谓传统体系和近代体系之间的过渡阶段,而两国之间事实上可能是两种国际体系在北线的直接碰撞。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那么,经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经走进近代国际关系的欧洲人介于两国之间斡旋的角色就特别值得研究。过去认为,类似于张诚(Gerbillon Jean Francois)这样的耶稣会士参与《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是因为其第三国国籍的关系,可以充当见证人和调停方,起到维持促进谈判的作用。但如果联系前述背景,张诚虽为中国皇帝指定的使臣之一,但在谈判过程中一再折中双方立场,甚至主张以拉丁文起草条约文句,这实际上是不是可以看作介于两个体系典型国家(朝贡体系领袖国、蒂利所谓“强制密集型国家”)之间的使者,试图将尚未完全进入近代主权国家体系的两个传统帝国拉入新体系的一种尝试呢?事实上,他最终达到了目的。从体系建构上来说,这恰恰是两种不同国际体系互相交融的历史性一刻。从这个角度来看《尼布楚条约》,似乎意义较之以往又多一层。

^① 马若孟(Ramon Myers)等学者认为,这一时间也可以上溯到19世纪20—30年代,即世界经济造成中国大范围内通缩并引发经济崩溃,参见Ramon H.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韩]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75页。

结 语

本文试图通过当下国际人文社科学界的热点问题即17—18世纪的中国,讨论其中国际关系学研究边界和范式的突破,证明这一问题尚存大量挖掘空间,回应既往学者的观点。只有通过断代的精细化个案研究,串联起不同阶段中国整体对外关系的不同面貌,才有可能将中国国际关系的历史遗产做较为全面的梳理,继而避免对“天下”“朝贡”等传统词汇的盲目注解,找到融贯古今的方式。目前,中国亟待一个与世界性而不仅是区域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原创国际关系理论。如果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只能在具有统一多民族国家性质的“大一统”^①时代才具备可比性。故而,加强对17—18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弥补理论的缺位,才有可能为学界和政策界提供服务。

如果国际关系学者能够在这一领域加强研究合力,乃至与史学界、宗教学界、哲学界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学术共同体,除了能在学科之间形成相互的助力之外,对于国关学界所关心的现实政策问题,同样也有帮助:第一,可以为复兴背景下的中国提供对外关系方面的历史注脚,对许多整体性政策和提议可以提供合法性注解;第二,对于边疆、民族等复杂的牵涉内外的现实问题,国际关系学应该与历史、区域研究的学者合力为这类带有历史遗留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乃至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本学科的相关回应;第三,在意识形态论争的重要领地里,帮助中国学界守住并提高话语权。在和海外学者的对话,尤其是批判对方论点时,避免流于机械地贴标签和扣帽子,而是通过共通的现代学术话语讲好300年前的“中国故事”,使对东亚和世界的一般性主流解释中,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

^① 李零:《我们的中国》(第一编:《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8页。